



中國統計史

李惠村 莫日达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统计史

李惠村 莫日达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京)新登字041号

中国统计史

ZHONGGUO TONGJI SHI

李惠村 莫日达

*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3.75印张 34.8万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37-1150-7/C·694

定价: 16.00 元

序

统计史是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统计活动与统计思想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统计发展规律，对于发展统计理论、指导统计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统计活动和统计思想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过去长时期中，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少。据我所知，30年代曾有刘大钧的《中国统计事业》和卫聚贤的《中国统计史》等论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统计学术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对我国统计史的研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关于新中国统计史的专著，有王一夫主编的《新中国统计史稿》，国家统计局科研所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统计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岳巍、莫日达、李恢宏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统计事业》。关于中国统计史的专著，有刘叔鹤的《中国统计史略》，朱君毅的《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还有赵章甫的《中国统计简史》（期刊连载论文）。此外，关于世界统计史的专著，有陈善林的《统计发展史》，李惠村的《欧美统计学派发展简史》，高庆丰的《欧美统计学史》等。应当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有这样多的统计史著作问世，是令人振奋的。上述各具特色的著作，对统计史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推动了统计史乃至整个统计科学的发展。李惠村和莫日达同志所著的这本《中国统计史》，是我国统计史研究的百花园中绽开的一朵鲜艳的新花。它的主要特点是把我国统计工作史与统计思想史结合起来，力求建立一个既包括统计组织、统计法规，又包括统计思想、统计方法的全面的统计史体系。应当说本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这本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了“史”与“论”的结合，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做到史实与观点的统一。同时，运用

历史比较法，通过对古今中外史实和学说的比较，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批判与继承等关系，努力弄清发展的脉络，探索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很可贵的。

这本著作采取了“厚今薄古”的原则，古代部分从简，近代特别是现代部分从详。书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我国要坚持统计政策，以改革促进统计工作与统计理论的发展；同时要坚持加强国际交流，学习与借鉴外国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我很赞成这些意见，并愿趁此机会提出一点对今后统计史研究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古今中外的统计史都要研究，而重点是近代特别是现代统计史。近年来，我国统计学界对中外统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就发达国家现代统计史（这里所说的现代，一般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后半期，来说，在统计理论方法发展史方面还不够详细深入，在统计活动发展史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我国实行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急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经验的情况下，急需加强薄弱环节，补起这片空白。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同志们能下苦功夫，从搜集资料做起，经过认真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写出一本或几本发达国家现代统计活动史和统计思想史的著作。统计史包括统计活动史与统计思想史。一本著作，可以对两者全面研究，以便于对实际与理论进行综合观察；也可以分别研究，以便于突出重点，使研究更加深入。这些，完全由作者自由选定。不过，有一种写法：古代部分基本上讲统计活动史，近代和现代部分基本上讲统计思想史，同一本书前后缺乏一贯性。我认为这种写法今后最好加以避免。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统计史研究的园地将会进一步出现繁荣兴旺、百花争妍的美好景色。

李成瑞

1993年5月22日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统计史	(1)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统计	(1)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经济	(1)
二、结绳记事	(2)
三、书契记数	(2)
第二节 夏代的统计	(3)
一、夏代的社会经济	(3)
二、夏代的统计	(4)
第三节 商代的统计	(8)
一、商代的社会经济	(8)
二、商代的统计	(8)
第四节 西周的统计	(11)
一、西周的社会经济	(11)
二、西周的统计组织	(12)
三、西周的统计工作	(13)
四、西周的统计方法	(15)
五、西周的统计思想	(17)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	(18)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18)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19)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工作	(21)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方法	(22)
五、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思想	(25)
第六节 简短的结论	(40)
第二章 秦汉统计史	(44)

第一节	秦代的统计	(44)
一、	秦代的社会经济	(44)
二、	秦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45)
三、	秦代的统计工作	(52)
四、	秦代的统计方法	(56)
第二节	汉代的统计	(57)
一、	汉代的社会经济	(57)
二、	汉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58)
三、	汉代的统计工作	(61)
四、	汉代的统计方法	(66)
五、	汉代的统计思想	(72)
第三节	简短的结论	(75)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统计史	(77)
第一节	三国的统计	(77)
一、	魏国的统计	(77)
二、	蜀国的统计	(79)
三、	吴国的统计	(79)
第二节	晋代的统计	(80)
一、	晋代的社会经济	(80)
二、	晋代的统计组织	(81)
三、	晋代的统计工作	(82)
四、	晋代的统计方法	(84)
五、	傅玄的统计思想	(85)
第三节	南北朝统计	(86)
一、	南北朝的社会经济	(86)
二、	南北朝的统计组织	(88)
三、	南北朝的统计工作	(88)
四、	南北朝的统计方法	(90)
五、	南北朝的统计思想	(92)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93)
第四章	隋、唐、五代统计史	(96)

第一节	隋代的统计	· · · · · ·	(96)
一、	隋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96)
二、	隋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 · · · · ·	(97)
三、	隋代的统计工作	· · · · · ·	(98)
四、	隋代的统计方法	· · · · · ·	(99)
第二节	唐代的统计	· · · · · ·	(100)
一、	唐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100)
二、	唐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 · · · · ·	(102)
三、	唐代的统计工作	· · · · · ·	(104)
四、	唐代的统计方法	· · · · · ·	(112)
五、	唐代的统计思想	· · · · · ·	(120)
第三节	五代的统计	· · · · · ·	(124)
一、	五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124)
二、	五代的统计组织	· · · · · ·	(125)
三、	五代的统计工作	· · · · · ·	(125)
四、	五代的统计方法	· · · · · ·	(125)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 · · · · ·	(127)
第五章	宋、辽、金、元统计史	· · · · · ·	(130)
第一节	宋代的统计	· · · · · ·	(130)
一、	宋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130)
二、	宋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 · · · · ·	(131)
三、	宋代的统计工作	· · · · · ·	(133)
四、	宋代的统计方法	· · · · · ·	(146)
五、	宋代的统计思想	· · · · · ·	(157)
第二节	辽代的统计	· · · · · ·	(162)
一、	辽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162)
二、	辽代的统计组织	· · · · · ·	(163)
三、	辽代的统计工作	· · · · · ·	(163)
第三节	金代的统计	· · · · · ·	(164)
一、	金代的社会经济	· · · · · ·	(164)
二、	金代的统计组织	· · · · · ·	(165)

三、金代的统计工作	(165)
四、金代的统计方法	(169)
第四节 元代的统计	(169)
一、元代的社会经济	(169)
二、元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171)
三、元代的统计工作	(172)
四、元代的统计方法	(177)
五、元代的统计思想	(180)
第五节 简短的结论	(181)
第六章 明清统计史	(185)
第一节 明代的统计	(185)
一、明代的社会经济	(185)
二、明代统计组织与法规	(187)
三、明代的统计工作	(188)
四、明代的统计方法	(196)
五、明代的统计思想	(200)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	(202)
一、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社会经济	(202)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203)
三、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工作	(205)
四、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方法	(210)
五、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思想	(213)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	(217)
一、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社会经济	(217)
二、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217)
三、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工作	(219)
四、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方法	(221)
五、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思想	(222)
六、鸦片战争后清代的统计理论	(226)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228)
第七章 中华民国统计史	(232)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社会经济	(232)
第二节	中华民国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234)
	一、北洋政府的统计组织	(234)
	二、国民政府的统计组织	(235)
	三、国民政府的统计法规	(240)
第三节	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计工作	(242)
	一、人口统计	(242)
	二、农业统计	(246)
	三、工业统计	(249)
	四、商业统计	(253)
	五、物价调查和物价统计	(255)
	六、运输统计	(260)
	七、教育、社会及卫生统计	(261)
	八、司法统计	(263)
	九、地质统计	(264)
	十、统计报告的编制	(265)
第四节	中华民国其他方面的统计工作	(266)
	一、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统计工作	(266)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研究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所做的统计工作	(269)
第五节	中华民国的统计学术活动	(271)
	一、西方统计理论的继续传人	(271)
	二、统计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273)
	三、中国统计学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276)
	四、参加国际统计学术会议	(277)
	五、统计人员的培训	(277)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统计工作	(278)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78)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81)
	三、抗日战争时期	(288)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96)

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	300
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史	304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	304
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统计	307
一、统计工作的开端	307
二、东北的统计工作	308
三、全国统一统计工作的准备	311
第三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统计	322
一、政务院《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322
二、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干部	325
三、清理统计表格，制定统计报表审批办法	326
四、加强统计工作与计划工作的密切配合，并确定省市统计局 与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的关系	328
五、逐步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专业统计报表制度	329
六、进行了专项调查和普查	337
七、制定了部分统计标准和分类目录	338
八、开展统计综合分析研究工作	339
九、统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340
十、反对脱离实际的倾向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统计工作的 总结	341
第四节 统计工作在曲折中前进	343
一、统计事业在“大跃进”中的曲折	343
二、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继续前进	353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统计	365
一、“文化大革命”对统计工作的严重破坏和统计人员的抵制、 斗争	365
二、统计工作的逐步恢复	367
第六节 新的历史时期的统计	373
一、新的历史时期的统计工作	373
二、新的历史时期的统计理论研究工作	412
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	426

第一章 先秦统计史

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它从远古起，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这一时期的统计，还处于萌芽和初创阶段。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统计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经济

中国的原始社会大体上分为两期：第一期，从原始群到氏族制的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的开端，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第二期，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到原始公社解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是中国原始社会的全盛阶段。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由于磨制石器工具的制作和广泛使用，原始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原来的采集狩猎经济，终于被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性经济所替代，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和制陶手工业；原始先民建立起原始部落，过着定居生活。由于生产劳动的进步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原始的精神文化也有所发展，人们开始有了数字概念和计数活动，出现了结绳记事，并逐渐产生了原始的绘画、雕塑艺术和刻划符号，发展为简单的文字，出现了书契记数。在氏族公社里，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划分，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土地、牲畜、工具属于氏族全体，劳动果实共同享用。氏族长由民主选举。几个氏族组成部落，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大约从五千年前开始，黄河、长江流域的众多的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

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原始手工业也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生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商品生产，从而奠定了私有制诞生和阶级起源的物质基础。所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也是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的阶段。中国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夏代。

二、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期的一种计量方法，是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传说结绳记事，始于伏羲时代。西汉时曾经出现伏羲与女娲结绳的画像；在东汉武梁祠的浮雕上还刻有“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铭文。

关于结绳记事的方法，郑玄在《周易正义》中的注解：“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路史·前纪》罗苹注，对此有所补充：“子夏易传云：上古官职未设，人自为治，记其事，将其命而已，故可以结绳为。九家易云：‘古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执以相考。’”这就说明，当时已产生了简单的分组（大事，小事），与简单的分组总量指标（大事件数，小事件数），成为我国统计的萌芽。

三、书契记数

原始公社时期，代结绳记事而起的一种比较进步的计量方法是书契记数。《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指文字，刻字在竹、木或龟甲、兽骨上以记数、记事，称为“书契”。一般认为书契“初以记数为始，后以简册为断。”我们称以数字为主体的经济记录为“书契记数”。

我国的原始文字和计量符号，始于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5000年—前3000年)，在仰韶文化遗址半坡、姜寨等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二、三十种各式各样的符号，一般认为是我国原始文字的起源，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计量、记录方法的运用。到了黄帝、尧舜时代（约公元前2491年—前2042年），创制了从一到十的数码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感到“结绳记事”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开始向“书契记数”的时代迈进。

第二节 夏代的统计

一、夏代的社会经济

约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奠定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初步基础。夏王朝自禹至桀，共为十七君，历时四百七十一年。

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有两个根本的特点：一是按地区划分居民；青铜器“叔夷钟”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左传》也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九州的划分，表明禹已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居民了，并有地方官“九牧”统治人民。又：“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①表明已有了刑法、监狱。《孟子·滕文公上》：“夏后世五十而贡”，《汉书·食货志》：“禹平水土，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柴。”说明夏王朝已具有赋税剥削形式。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即夏已有“城郭沟池”保护私有财产；并有军队进行长期战争。这样，夏朝这个奴隶制国家就成为奴隶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奴隶的机关。夏王朝的官僚机构已具雏形，主要官吏有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有牧正、庖正、车正等，掌政事，也管生产。

夏代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适于发展农业的黄河冲积地带。生产工具主要有种地用的木耒和收割庄稼用的石刀、蚌镰等，还有各种骨器和少量的青铜器。在生产中，人们逐渐懂得利用水利，

掌握了原始的灌溉技术。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夏代人的天文历法知识逐渐丰富起来。《左传》所引的《夏书》记录了当时的一次日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朝已有历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农历或“夏历”。夏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随着制陶业的发展，陶窑作坊也出现了。

夏代的后期，约到公元前 16 世纪，夏王桀对人民进行暴虐统治，为商汤所灭。

二、夏代的统计

(一) 人口与土地统计

夏朝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对奴隶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对外对内职能，需要征集兵员、徭役和赋税，这就要对全国人口和土地进行统计调查。魏晋间皇甫谧著《帝王世纪》对此有下列记载：“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定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后，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与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等，都有同样记载。因此，有的统计学者认为这些统计数字是“我国最早的统计数字资料。”

但可疑的是：其后商代的人口、土地统计数字，反倒由于“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全，无以考之。”^②而且据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记载，一般只有商代的登人、军事、祭祀与田猎等方面的统计数字，而且这些数字在一千以上的，一般只有概数，如登帚妣(族名)三个、登旅一万，呼伐羌；一千以下的数字，才有具体的百、十、个位数。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虽可能进行过人口与土地统计，但上述统计数字极不可信，不宜称之为“我国最早的统计数字资料”。

(二) 《禹贡》的国势调查

《禹贡》为《尚书》中的一篇，是一篇反映夏代国势调查的重要

文献。《尚书》相传为孔子编述而成，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其中《禹贡》篇，学者多认为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作者不详，著作时代也无定论。

《禹贡》篇全文1193字，把全国分为翼、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记述各州的基本情况，如治水的次序，州境的区域，河川的原委，土壤的性质，田、赋的等级，植物的种类，贡物的名称，贡道的流向等。没有任何数字记载。现摘录《禹贡》开头一段与关于翼州的记述原文如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河。”“翼州，既载壶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潭。厥土唯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为了便于理解，现译为语体如下：“禹治理土地，顺着山岭砍伐树木，奠定了高山大河。”“翼州：既已从壶口山开始治理，然后就去治理梁山和岐山。治理了太原以后，便转到岳山的南面。治理覃怀，建立了功绩以后，便又转移到河水横溢的衡水和漳水。翼州的土壤细白，所纳的田赋是第一等（上上），并夹杂着第二等（上中）。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五等（中中）。恒水和卫水既已顺流而下，大陆泽一带就可以耕种了。岛夷（东北的夷民）都穿着皮衣服，（运输贡品的船只）夹杂着右边的碣石山驶入黄河。”其余八州记述的内容与此类似，不再一一列举。

《禹贡》篇已按土质的优劣把九州的田、赋进行了复合分组，即首先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又按“级”在各等中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共分为三等九级。这在世界统计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

现将《禹贡》中田、赋的复合分组列表说明如下，

分 组		说 明		
等	级	组 名	等 级	总 级 别
上	上	上 上	一等一级	一 级
	中	上 中	一等二级	二 级
	下	上 下	一等三级	三 级
中	上	中 上	二等一级	四 级
	中	中 中	二等二级	五 级
	下	中 下	三等三级	六 级
下	上	下 上	三等一级	七 级
	中	下 中	三等二级	八 级
	下	下 下	三等三级	九 级

这样，总组数(总级别)为等数(3)与级数(3)的相乘积(9)。

《禹贡》篇的性质，相当于17至18世纪的德国国势学派(记述学派)中的格廷根学派的统计学，采用记述的方法研究国家显著事项的情况，缺乏数量的观察，没有任何推论，以说明其规律。因此，1770年法国传教士格毕(Gaubil, 1689—1759)在巴黎发表了他的法译本《尚书》^③后，欧洲一些统计学者见到其中的《禹贡》篇后，大为震动，认为统计学最早的萌芽要追溯到最早的文化民族中国。日本统计学者横山雅男在其《统计通论》(1903年)一书中说：“《禹贡》篇‘若从现时统计学观之，虽似毫无价值；然从记述学派而言，未始不足供一谈，况远在数千年前，而已有此种调查乎？故揭之以供参考。”^④于是他根据《禹贡》篇原文编制了《禹贡九州表》。^⑤

我国王仲武在其所著《统计学原理及应用》(1927年)中采用了此表，惟排列形式上有所改变。刘叔鹤在其所著《中国统计史略》(1990年)中，则补充了“山泽”一栏。^⑥